

第一章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 古代港口遗址及相关研究

第三节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交流相关考古学研究

(一) 南亚与东南亚交流的阶段划分及阶段性特征

在汉武帝西汉中期开辟从合浦郡始发经东南亚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贸易航线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短程的区域内和跨区域交流已经存在。东南亚铁器时代遗址往往延续了数百年，遗址或墓葬遭到非法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地层完整性差，绝对年代测定数据少，碳十四测定在这一时间段内又存在局限，很多时候只是将器物年代确定在一个时间范围内。为在一个较为一致的时间框架内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社会背景，阶段性的贸易交流特征以及对考古发掘的器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必要对南亚与东南亚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交流进行阶段划分。

环孟加拉湾交流圈（主要包括环孟加拉湾的滨海地带、印度次大陆的东部地区、东南亚的西部地区）的交流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这种交流包括人的流动和技术、文化的扩散，以及新石器时代自中国南海周边地区至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与扩张。古普塔(s. Gupta)将环孟加拉湾交流圈的交流（包括印度、东南亚与罗马帝国、非洲等地区的交流）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约 1000-500 BC、500-1 BC 和 1-500 AD^[118]。古普塔所引用的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包括植物志（香蕉、芋头、大薯、桂皮、肉桂等）、植硅体、瓮棺葬、贝饰、印度—太平洋贸易珠、陶器（如 Rouletted Ware）等。贝尔伍德(P. Bellwood)认为^[119,120]：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东部苏拉威西海(Sulawesi Sea)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对南太平洋岛屿的开拓在公元前第 2 千纪的晚期已经开始，他们在公元前 1000 至前 500 年期间可能在西太平洋从事远距离的货物运输和贸易。孟加拉湾东南部的海滨地区如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可能是早期东南亚海上探险的集结地。

贝琳娜(B. Bellina)和格洛弗(I. c. Glover)提出将印度与东南亚早期交流的发展划分为二个阶段，并同时探讨了这两个阶段中印度与罗马帝国的交流^[121]。他们认为，交流的第一阶段约从公元前 4 世纪开始，在公元 2 世纪末结束；第二阶段在公元 2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之间。这两个阶段中贸易品的种类、数量、质量，以及交流的广泛性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其中，第一阶段以交换印度生产或至少是受印度影响所生产的高质量玻璃和石质珠饰、陶瓷和青铜器物为主要特征，交流的强度低，器物数量少；第二阶段中东南亚区域内以及与印度的交流强度都明显提高，东南亚开始在本地生产印度风格的陶器，依然从印度输入玻璃和石质珠饰，数量开始增多。在这两个阶段中，东南亚可能吸收印度技术并利用本地区资源进生产了一定数量具有印度风格、东南亚本地风格的珠饰。

公元前 500 至公元 500 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交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上述对南亚与东南亚交流的阶段划分只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可借鉴的时间框架，有必要结合我国的考古学资料对海上丝绸之路交流进行审视，并更细致地对交流阶段进行划分。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我国西南、华南地区就与东南亚、印度有着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122-125]，而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正式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后，我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就更加广泛，而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如佛教）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要到公元 500 年之后才变得强烈和明显。

在对环南中国海区域早期交流的研究中，除陶器外，学者们也对玉器给予了特别关注，其中对廓外带有凸起装饰的特殊器形玉块的研究，为这种早期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这种特殊器形的玉块在我国台湾的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遗址、浙江衢县、广东石峡文化遗址、广西武鸣和平乐银山、香港南丫岛、贵州赫章可乐，越南的冯原文化遗址、沙莹文化遗址，以及菲律宾巴拉望的塔邦洞穴 (Tabon Cave)、吕宋岛等地点具有发现，以廓外有凸起的“C”形、山字形、锯齿形、花蕾形等装饰（多为 4 个）为特征，分布时间大致从距今 4000 年至西汉^[126, 127]。目前有“有角玦石轮”、“带角型玦”、“越式具凸饰玦”等，本章以“有角玦”称之。

正是由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公元前 500 年之间我国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通过陆地和海上路线与东南亚的交流，为之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500 年间，来自印度的珠饰等物品可能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某些东南亚与我国南方在战国之前的交流所建立的贸易网络，从而得以快速流通。综合考虑我国和印度与东南亚的交流状况，本章作者初步认为：在 500 BC 至 500 AD 时间范围内，可将东亚与东南亚、印度乃至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大致划分为：1) 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100 年；2) 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200 年；3) 公元 200 年至公元 500 年这三个阶段。我国合浦、广州等地在第二个阶段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有最广泛的交流。

（二）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和东南亚复杂社会形成

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分别是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古印度则先后经历了孔雀王朝（约 324-188 BC）、巽加王朝（约 185-73 BC）、贵霜帝国（约 45-425 AD）、甘婆王朝（约 73 BC-28 AD）等，在东南亚则只有湄公河中下游的扶南王国（约公元 1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是国家性政体。汉帝国、古印度与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多是与酋邦、城邦、城市化聚落等社会复杂体进行。^[128]汉代合浦郡和合浦港是当时国内物资集散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它对发展中西交通和贸易起着重要枢纽作用。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兴起，是沿线的汉帝国、罗马帝国等迫切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而扶南王国的登上历史舞台也与东西方海上贸易的繁荣密切相关。尽管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从海上、陆上受到了来自汉帝国、古印度的强烈影响，社会复杂化体

也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加速形成，东南亚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外来影响，其区域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贸易扩张、外来文化本土化、财富的集中、农业发展、人口的增长等，也是复杂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129-131] 东南亚大陆靠近海岸地区的孟—高棉语系人群，海岛区域马来半岛马来语人群、印尼群岛西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人群，由于所在地区的丰富资源、优越地理位置、良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等原因，为海上丝绸之路长距离贸易网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32-135]

目前，基于考古学资料探讨印度与东南亚的早期交流、印度对东南亚文明发展的影响，有较多的报道。从泰国的三乔山、班东达潘遗址出土器物看，印度北部和东部与东南亚的交流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但直至公元4世纪东南亚与古印度的交流主要是贸易交流。自公元4世纪开始，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影响则逐步增强，这与笈多王朝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大量印度教、佛教的建筑物（如佛塔、寺庙）、雕像、梵文碑铭等开始出现。^[136, 137] 早期研究中西方学者采用“印度化”这一概念来描述古代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例如，由于印度尼西亚西部早期历史时期的国家的建筑、艺术、文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印度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的强烈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历史学者倾向于认为东南亚岛屿地区的早期国家是照搬了印度模式，印度婆罗门和佛教文化、印度农业技术的传入和影响是这些早期东南亚岛屿国家形成的主要原因，认为东南亚岛屿地区的早期国家是所谓的“印度化国家”。^[138, 139] 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不少支持者。也有不少学者如霍尔(D. G. E. Hall)则较早地提出“应把东南亚作为它本身就是具有值得重视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因这个地区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后才值得重视的地区而历史地加以介绍”。^[140]

库尔克(H. Kulke)则在1990年提出了“趋同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认为印度次大陆的南部、东部与东南亚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是国家形成的时间也很晚，孟加拉湾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几乎与印度的这些地区是同步的；印度东部和南部海岸在公元7至8世纪流行建设寺庙，而这种风尚在数十年内就重播到了爪哇岛，但爪哇岛的寺庙建筑风格并未照搬印度的原型，二者之间只是一种文化趋同性。^[141] 海厄姆(C. Higham)强调了聚落模式变化对于东南亚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142] 随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外学者对东南亚本土文化、历史发展，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有了较多客观性的认识。^[143, 144] 肯定了东南亚在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融入正在发展中的长距离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体系，对于东南亚复杂社会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影响。

有众多的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资料说明，自新石器时代至元、明时期中国一直与东南亚大陆和岛屿地区有广泛的交流，先进文化和技术不断传播至东南亚，促进了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例如，童恩正对红河流域与四川地区青铜至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所呈现的众多一致性做了深入研究和系统论述。童恩正认为东南亚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某些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的最集中的地区，并不是云南，而是四川，云南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通道，但不是起点。并从粟米种植、葬俗（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遗址（巨石文化？）以及某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方面，论述了古代四川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122]。以船棺葬为例，巴蜀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实行船棺葬的地区，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流行。船棺葬墓葬在巴东、昭化、郫县、浦江、峨眉、绵竹等地均有发现。东南亚地区，越南的朱芹、朱山、越溪（相当于中国的秦汉时期）、隆洛卯（公元2世纪），马来西亚的甘榜双溪郎（Kampong Sungai Lang）遗址（公元前2世纪左右），沙捞越的尼阿（Niah）洞穴遗址（公元前2世纪左右），泰国北碧省的翁邦（Ongbah）洞穴遗址（公元前3世纪）均发现有船棺葬。巴蜀的船棺葬一般略早于东南亚。中国和越南的史籍中均记载战国时期至西汉初，在今越南北部红河中下游地区有文郎国，都封洲（今富寿省），后为安阳王所灭。而根据文献《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的记载，安阳王可能是被秦所灭而南逃的蜀国王室一支中的“蜀王子”。有理由推测东南亚的船棺葬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雷雨认为：在越南冯原文化晚期遗存出土的部分玉器和少部分陶、石器已体现出某些外来文化因素；东山文化时期船棺葬开始出现，铜鼓大量出现，外来文化因素则有增多的趋势，而这些外来因素中相当一部分明显与四川地区同时代以至较早时期的文化因素相似。^[145]

（三）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的可能衔接

西南丝绸之路国内段起点为成都，向南分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即，汉“零关道”、“西夷道”，唐“清溪关道”）南下，经今双流、新津、邛崃、芦山、蒙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沿岷江而下，经彭山、乐山、犍为至宜宾，再沿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即，古楚道，汉“南夷道”，隋唐“石门道”、“牂牁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云南大关、贵州威宁、云南昭通、曲靖，西折至昆明、楚雄，到达大理。东、西两路在大理会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入缅甸八莫。^[146]

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主要可分为西路和东路二条通道。西路即是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从成都经云南，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乃至中亚和西亚其他地区，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东路，则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又可分为2条路径。一是从云南出发，利用红河航行至越南，这条路线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或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麻栗坡等地，出云南东南角隅，经河江、宜光，循盘龙江，抵达河内。^[147]

从滇入越南的2条路径分别称为进桑道和步头道，进桑道沿盘龙江而下，步头道沿红河而下。西汉时期牂牁郡进桑县为郡南部都尉治，进桑道为汉晋时期由滇至越南之要道。

当时中央王朝经营南中（主要指四川凉山州和云南等地），其主要趋势是由北而南和由东而西，西汉之设置越巂、益州、牂牁三郡及犍为南都尉，以及西晋之设置越巂、云南、永昌、建宁、兴古、牂牁、朱提七郡莫不如此向前推进。进桑道偏于东部，较易受中央王朝控制，是官道之所在。迄今麻栗坡县盘龙江（南温河）畔之天保口岸仍是中国通向越南的重要关口。李绍明认为：“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审视，沿红河的步头一途，元江以下即可通舟楫，交通条件较为优越。……为古代蜀人由滇进入越南最为便捷之佳径。”^[148]

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一条支线“牂牁道”，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从成都至黔中，通过红水河、黔江、西江水路，经贵州、广西抵达合浦、徐闻、广州等地，由此即可进入南海。由此可见，整个西南地区、华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都可与中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我国广西、云南等地，与越南和东南亚古代民族之间存在若干共性，有着某种共同渊源关系。民族源流、民风习俗的相近，都是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